

# 青少年童年创伤对校园欺凌影响的研究

李丽娜\*, 陈馨悦\*, 王瑞鑫, 熊海涛, 张紫璇, 朱会兴, 张 郢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 河北 唐山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 摘 要

近年来, 校园欺凌现象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普遍。校园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 一方(个体或群体)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既包括直接欺凌也包括间接欺凌。童年创伤是指个体在儿童期遭遇的超过其应对能力的创伤事件。童年时期是个体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经历甚至会影响一个人成年后的特征。因此, 探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影响机制, 为构建基于创伤知情的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聚焦于青春期中晚期的青少年, 并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整合性梳理, 旨在系统探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影响, 并揭示个体早期经历如何深刻塑造其行为模式。

## 关键词

青少年, 童年创伤, 校园欺凌

#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Lina Li\*, Xinyue Chen\*, Ruixin Wang, Haitao Xiong, Zixuan Zhang, Huixing Zhu, Ying Zh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0,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hool bullying has evolved into a pressing global social issue, with a particularly

\*共一作者。

文章引用: 李丽娜, 陈馨悦, 王瑞鑫, 熊海涛, 张紫璇, 朱会兴, 张郢(2026). 青少年童年创伤对校园欺凌影响的研究. 心理学进展, 16(4), 527-533. DOI: 10.12677/ap.2026.164226

**high prevalence among adolescents. Defined as an act occurring inside or outside campus where an individual or group intentionally or maliciously inflicts physical harm, property damage, 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n another individual or group through physical, verbal, or cyber means, school bullying encompasses both direct bullying and indirect bullying. Childhood trauma refers to traumatic events that individuals experience in childhood that exceed their ability to cope. Childhood is a very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vidual,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is period can even affect a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in adulthood.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hildhood trauma on adolescent school bullying,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a trauma-informed school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adolescents in middle and late adolescence and provides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 conducted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recent years. It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adolescent school bullying and reveal how individuals' early experiences profoundly shape their behavior patterns.**

## Keywords

Adolescents, Childhood Trauma, School Bully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中学生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逐渐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陈玉佩,张颖,2025)。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显示,全球各国均普遍存在校园欺凌的现象,每年约2.46亿学生遭受欺凌,平均每三名学生中就有一人曾经历过欺凌(王润,2025),其中在中学阶段的发生率尤为突出。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从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事件(史天东等,2025)。本文所探讨的“青少年”特指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处于青春期中期至晚期的个体,这一群体主要对应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在校学生。该时期是个体从儿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一个阶段,也是形成健全人格的一个关键阶段,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会给青少年带来严重的伤害(Wang et al., 2024; Whipp et al., 2021)。对于欺凌者而言,他们可能会养成不良行为习惯,从而影响自身道德和价值观的发展,给社会带来危害(Hong, Espelage, & Rose, 2019)。而对受欺凌者来说,他们不仅可能长期处于自卑、恐惧与无助的情绪状态中,从而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还会在人际互动中逐渐退缩、回避,甚至形成社交障碍,损害其社会功能的发展(熊宇翔等,2025)。

以往研究多从个人心理特质、同伴关系、学校氛围等即时性因素探讨欺凌成因。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早期的负面生活经历,特别是童年时期遭遇的创伤,同样是影响欺凌的关键因素(谢琳琳等,2024)。童年创伤经历是指个体在童年期受到其父母或重要他人的虐待(包括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与忽视(包括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的经历(Felitti et al., 1998)。大量研究表明,童年创伤不仅与身心健康问题高度相关,更直接塑造着青少年阶段的行为模式与人际策略。因此,本综述聚焦于青春期中晚期的青少年,旨在系统梳理童年创伤影响其校园欺凌行为的相关研究,阐明其内在机制,并为干预实践提供方向。

## 2.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影响

### 2.1.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欺凌行为的理论基础及以往研究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我们通过观察他人来学习,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着他人。社会学习理论为理解童年创伤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Yang et al., 2018)。其认为,家庭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场所,他们通过观察并模仿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行为,来学习如何处理冲突和压力。在充满冲突、暴力或情感忽视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通过观察和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形成了“冲突通过暴力解决”的错误认知。随着个体的成长,学校成为其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这种在家庭环境中形成的错误认知,也会延伸至校园环境中,使得个体在面对冲突时更倾向于使用攻击行为去解决,从而增加了其实施欺凌行为的风险(谭德琴等, 2025)。此外,童年时期遭受虐待或忽视的经历,也会扭曲儿童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使其更容易形成暴力与攻击性的不良应对模式。长期的虐待或忽视会使儿童失去安全感,并形成“他人是危险的”错误认知。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他们容易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敌意归因,并试图通过攻击行为去“保护自己”。这些不良的应对模式也会迁移到校园环境中,进而增加了他们校园欺凌的风险。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Jeon & Bae (2022)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对 316 名韩国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相较于无创伤经历的青少年,曾遭受虐待的青少年出现精神障碍、卷入人际暴力及产生其他社会适应问题的风险显著更高。虽然社会学习理论为理解童年创伤与青少年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但其局限性在于只强调了环境的塑造作用,却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并非所有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都会成为欺凌者,该理论难以解释这种个体差异。

暴力代际传递理论主要探讨的是暴力行为在家庭内部或个体生命周期中重复出现的现象,即成长过程中经历或目睹暴力的个体,在日后更有可能成为暴力行为的实施者(Meinck et al., 2025)。如果父母经常用暴力解决问题,孩子可能就会内化这种行为,认为暴力是正常或有效的互动方式,这种认知将根植于其观念中,成为其成年后处理人际冲突的默认脚本,导致暴力模式在人际关系中不断复现(Kim, 2012)。随着个体的成长,当其进入校园这一次级社会化场所之后,这种在家庭中习得的暴力模式便会被激活并泛化到同伴关系中,具体就表现为校园欺凌行为。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论,即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Bounoua et al., 2020)。Bounoua 等人纳入 138 名不同种族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对大脑皮质进行全脑分析发现,早期暴力暴露不仅会改变大脑结构,这种改变还可能成为将童年受害经历转化为成年施暴行为的关键生物学通路。然而,一项元分析研究表明,只有三分之一遭受童年创伤的个体可能成为施暴者,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经历童年虐待的个体都会成为暴力实施者(Augsburger, Basler, & Maercker, 2019)。这一发现也凸显了暴力代际传递理论的局限性,同时也未能系统阐明保护性因素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这些保护性因素的作用,以完善对童年创伤与校园欺凌关系的理解。

### 2.2. 童年创伤对青少年受欺凌行为的理论基础及以往研究

依恋理论是由 Bowlby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系统提出的,其阐述了早期个体与主要照料者之间的情感联结如何深刻影响其一生的人格发展、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Cassidy & Shaver, 1999)。该理论认为早期的童年创伤会破坏安全依恋的形成,导致儿童发展出扭曲的“内部工作模型”和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即形成“我是无用的”等消极认知。这些模式直接增加了他们在同伴关系中的脆弱性,影响个体在后续人际关系中的行为策略。也就是说,早期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个体,更易形成不安全依恋,其在校园环境中与同伴交往时害怕被他人拒绝和抛弃,因此在同伴关系中处于弱势,更易成为受欺凌的对象(胡岳等, 2020)。而且, Lereya 等人(2015)在对两国队列的纵向研究中发现,童年遭受忽视(特别是情感忽视)的青少

年, 更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这是因为早期的忽视会导致其在成长过程中自我价值感低下、社交技能发展滞后、情绪表达能力不足, 使其在同伴群体中显得“与众不同”或“易于操控”, 从而更加吸引欺凌者的注意(Perry & Szalavitz, 2017)。与此同时, 由于缺乏安全的依恋基础, 这些青少年对他人缺乏信任, 在遭受欺凌时可能更少向成人求助, 倾向于独自承受, 从而陷入长期受害的恶性循环。虽然依恋理论为理解童年创伤如何影响青少年受欺凌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发展心理学视角, 但其在文化适用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争议。该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 主要强调个体自主性。而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东亚文化背景下, 对“安全依恋”的界定和测量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此外, 习得性无助理论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该理论是指个体经历了反复的失败、挫折或惩罚后, 感到自己对局面完全失去控制, 从而形成一种对现实无望, 消极被动的心理状态(Seligman & Maier, 1967)。反复虐待或忽视的童年创伤经历易使青少年形成消极的认知图式, 损害其社会功能的发展。这种受损状态常常表现为抑郁、恐惧及无助感, 导致个体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Hames et al., 2013)。这种认知图式一旦形成, 就会泛化至校园环境中, 使个体在面对潜在的欺凌威胁时, 倾向于放弃主动应对。当面临压力或遭遇同伴冲突时, 他们往往因难以有效调动心理与社会资源而处于弱势, 从而更容易成为同龄人欺凌的目标。与此同时, 反复的受欺凌经历会进一步强化其无助感, 使其长期处于劣势。Bai 等人(2025)通过对四川省公立学校的 1327 名青少年进行研究, 发现遭受过虐待的青少年常常会面临“再受害”的现象, 即曾在某一关系中受到伤害的青少年, 相较于未受害者, 更容易在原系统或新的关系系统中再次遭受伤害。该研究揭示了童年创伤与校园受欺凌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此外, 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 Goemans 等人(2023)通过系统梳理 28 项相关研究发现, 经历过情感虐待的青少年遭受同伴欺凌的可能性是普通青少年的 2 至 4 倍。该研究也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神经机制, 结果发现童年创伤会改变儿童大脑中“威胁系统”、“奖赏系统”及“自传体记忆系统”的功能, 从而使其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由此, 我们发现习得性无助理论与依恋理论互补, 依恋理论强调家庭关系对自身认知及行为模式的影响, 而习得性无助理论则强调个体的“可控性预期”。两者结合可以更全面地解释“再受害”现象, 即不安全依恋导致个体对他人缺乏信任, 而习得性无助导致个体对自身能力缺乏自信, 二者共同作用, 使个体在遭受欺凌后既不相信他人, 也不相信自己, 从而陷入长期受害的恶性循环。

### 3. 中介及调节机制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校园欺凌影响中的作用

#### 3.1. 中介机制

##### 3.1.1. 情绪调节因素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策略管理、表达和应对情绪的过程。情绪调节困难是连接童年创伤与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的重要中介变量。有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 尤其是经受过情感虐待与忽视的青少年, 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受到了损害, 使其难以有效识别、表达和管理情绪。在欺凌行为方面, 情绪调节困难的青少年更倾向于以外化行为去应对负面情绪, 从而增加攻击的风险。而当面临同伴冲突时, 情绪调节困难的青少年表现出情绪不稳定或退缩行为, 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同伴群体中更易成为欺凌目标(Shields & Cicchetti, 2001)。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区分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在创伤—欺凌关系中的不同中介作用, 并探索情绪调节训练在干预中的有效性。

##### 3.1.2. 社会认知因素

童年创伤会扭曲个体对自我、他人及社会互动的认知图式。经历过童年创伤的青少年, 更容易形成敌意归因偏向, 即倾向于对他人的中性行为进行恶意解读, 这种错误的认知偏差显著增加了其攻击他人的可能性(Dodge et al., 2006)。与此同时, 创伤经历还可能使个体对暴力行为持正向的态度, 认为攻击是

解决问题的合理手段(谭德琴等, 2025)。在校园受欺凌中, 创伤经历则可能导致个体形成负性的自我认知, 使其在同伴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 更容易遭受欺凌(Lereya et al., 2015)。此外, 童年创伤还会损害青少年的共情能力, 使其难以理解和感受他人的痛苦, 从而降低实施攻击行为时的愧疚感。因此,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整合多维度社会认知因素的链式中介模型, 并借助纵向研究厘清各因素在童年创伤与校园欺凌间的作用, 为构建基于创伤知情的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 3.2. 调节机制

### 3.2.1. 个体因素

个体的心理特质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校园欺凌的影响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特质包括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自尊以及自我控制等多个维度。一项基于 29378 名参与者的元分析发现, 童年时期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预测青春期更低的欺凌受害风险, 这表明自我控制是跨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保护性因素(Bilgin et al., 2024)。与此同时, Kim-Spoon 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 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即使在经历童年创伤后, 也更少表现出攻击行为。此外, 肖雪等人(2022)通过对来自中国 24 所中学的 3879 名青少年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心理韧性在童年创伤与欺凌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但是在极端高风险的个体中, 心理韧性的保护作用可能受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特质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从而帮助青少年打破创伤向欺凌转化的链条。

### 3.2.2. 环境因素

家庭和学校是重要的环境调节因素。对于青少年来说,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初级场所, 而学校则是其第二个社会化的场所。在家庭层面, 良好的家庭环境、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均能够缓冲童年创伤的负面影响(Côté et al., 2025)。在学校层面, 积极的校园氛围、同伴支持以及良好的师生关系均被证实能够削弱童年创伤与欺凌行为之间的关联(Tao et al., 2025)。由此可见, 尽管童年创伤增加了青少年校园欺凌的风险, 但是后期的积极环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阻断这一路径。

## 4. 未来研究展望

当前研究大多都是在横断面设计下进行的, 未来需要更多纵向研究来厘清童年创伤与校园欺凌的因果关系。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文化差异、网络欺凌等新型欺凌形式的影响。此外, 如何在学校环境中有效实施创伤知情照护仍面临很大的挑战。对于家庭来说, 我们可以为有创伤史的家庭提供亲职教育、心理支持和资源链接, 从源头上改善孩子的成长环境, 减少孩子遭受创伤的风险。对于学校而言, 既要预防又要干预。首先在预防方面, 应该建立早期识别系统, 对全体教职工进行“童年创伤”及“欺凌”相关知识的培训, 让老师能识别学生情绪行为异常背后的可能原因, 避免二次伤害。同时, 在干预方面, 要为有创伤经历或受欺凌的学生提供个体或团体心理咨询, 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4SH011)。

## 参考文献

- 陈玉佩, 张颖(2025). 初中生同伴压力与校园欺凌行为的关系: 道德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20(3), 109-111.
- 胡岳, 张玉婷, 陈毅文(2020). 焦虑障碍患者童年创伤与成人依恋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4(9), 729-735.
- 史天东, 李光霞, 郭克英(2025). 受校园欺凌与家庭养育环境的关系研究. *心理月刊*, 20(18), 103-106+187.
- 谭德琴, 丁菀, 宋省成, 等(2025). 代际间的暴力传递——父母虐待对儿童欺负行为的影响: 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41(3), 410-419.

- 王润(2025). 校园欺凌对中小學生抑郁的影响: 自尊和表达抑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 肖雪, 郭磊, 赵永萍, 陈富国(2022). 累积生态风险与初中生受欺凌的关系模式: 心理弹性的调节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5), 648-657.
- 谢琳琳, 文盼, 林柔媚, 李丽萍(2024). 儿童虐待经历与校园欺凌受害关系的 Meta 分析. *伤害医学(电子版)*, 13(4), 54-62.
- 熊宇翔, 潘水波, 林锦峰, 韦乔悦, 吴俊端(2025). 青少年受欺凌经历与焦虑抑郁症状关系的网络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46(10), 1376-1380.
- Augsburger, M., Basler, K., & Maercker, A. (2019). Is There a Female Cycle of Violence after Exposure to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9, 1776-1786. <https://doi.org/10.1017/s0033291719000680>
- Bai, T., Lang, M., Jin, Y., Li, J., & Chen, P. (2025).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of Childhood Abuse, Bullying,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 Serial Mediation Analys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Article ID: 158679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5.1586797>
- Bilgin, A., Wolke, D., Trower, H., Baumann, N., Räikkönen, K., Heinonen, K. et al. (2024). Emotional Problems and Peer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ts Born Very Preterm and Full-Term: Role of Self-Control Skills in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6, 302-311.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22001201>
- Bounoua, N., Miglin, R., Spielberg, J. M., & Sadeh, N. (2020). Childhood Assaultive Trauma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Links with Cortical Thickness in Prefrontal and Occipital Cortices. *NeuroImage: Clinical*, 27, Article 102321. <https://doi.org/10.1016/j.nicl.2020.102321>
- Cassidy, J., & Shaver, P. R. (1999).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Vol. 236). Rough Guides.
- Côté, C., Roy, D., Thiemann, R., Hartwick, C., Madigan, S., & Racine, N. (2025).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rauma Symptoms in Maltreated Children: The Role of Child and Caregiver Protective Factors. *Child Abuse & Neglect*, 169, Article 107664.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5.107664>
- Dodge, K. A. (2006). Translational Science in Action: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r Problem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8, 791-814.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6060391>
- Felitti, V. J., Anda, R. F., Nordenberg, D., Williamson, D. F., Spitz, A. M., Edwards, V. et al. (1998).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and Household Dysfunction to Many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4, 245-258. [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https://doi.org/10.1016/s0749-3797(98)00017-8)
- Goemans, A., Viding, E., & McCrory, E. (2023). Child Maltreatment, Peer Victimization, and Mental Health: Neurocognitive Perspectives on the Cycle of Victimization.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4, 530-548.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211036393>
- Hames, J. L., Hagan, C. R., & Joiner, T. E. (2013).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9, 355-37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50212-185553>
- Hong, J. S., Espelage, D. L., & Rose, C. A. (2019). Bullying, Peer Victimization, and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2329-2334.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9-01502-9>
- Jeon, M. S., & Bae, E. B. (2022). Emotions and Sensory Processing in Adolescents: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51, 136-143.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22.03.054>
- Kim, K. (2012).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ori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17, 395-405. <https://doi.org/10.1111/j.1365-2206.2011.00793.x>
- Kim-Spoon, J., Haskett, M. E., Longo, G. S., & Nice, R. (2012).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lf-Regulation, Positive Parenting,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among Physically Abused Children. *Child Abuse & Neglect*, 36, 95-107.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1.09.016>
- Lereya, S. T., Copeland, W. E., Costello, E. J., & Wolke, D. (2015). Adult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Peer Bullying and Maltreatment in Childhood: Two Cohorts in Two Countries. *The Lancet Psychiatry*, 2, 524-531.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15\)00165-0](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15)00165-0)
- Meinck, F., Lu, M., Suresh, D., Cetin, M., Neelakantan, L., Hemady, C. et al. (2025).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iolence Perpetration? A Realist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1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88527>
- Perry, B. D., & Szalavitz, M. (2017).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Dog: And Other Stories from a Child Psychiatrist's Notebook—What Traumatized Children Can Teach Us about Loss, Love, and Healing*. Hachette UK.
- Seligman, M. E., & Maier, S. F. (1967). Failure to Escape Traumatic Shock.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4, 1-9. <https://doi.org/10.1037/h0024514>

- 
- Shields, A., & Cicchetti, D. (2001). Parental Maltreatment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30*, 349-363. [https://doi.org/10.1207/s15374424jccp3003\\_7](https://doi.org/10.1207/s15374424jccp3003_7)
- Tao, Z., Wang, Z., Chen, Y., Lan, Y., & Zhang, W. (2025). Childhood Abuse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s: Different Protective Factors from the School Setting. *Current Psychology, 44*, 4072-4082.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4-06914-5>
- Wang, X., Wang, H., & Wang, W. (2024).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among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elf-Esteem,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Psychology of Violence, 14*, 56-65. <https://doi.org/10.1037/vio0000490>
- Whipp, A. M., Vuoksima, E., Korhonen, T., Pool, R., But, A., Ligthart, L. et al. (2021). Ketone Body 3-Hydroxybutyrate as a Biomarker of Aggression. *Scientific Reports, 11*, Article No. 5813.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1-84635-6>
- Yang, M., Font, S. A., Ketchum, M., & Kim, Y. K. (2018).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Effects of Maltreatment Typ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1*, 364-371.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8.06.036>